南京狮子冲南朝大墓墓主身份的探讨

许志强　张学锋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2013年1—6月，南京市博物馆在南京市栖霞区新合村狮子冲调查并发掘了两座特大型南朝砖室墓。两墓虽因故未能清理完毕，但其所处位置、墓葬规模、墓室形制、残存砖印壁画、陵前石兽、出土的纪年砖铭、毁损程度与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表明，两墓的墓主分别为梁昭明太子萧统及其生母丁贵嫔。

关键词：南朝陵墓　昭明太子　萧统　丁贵嫔　石兽　砖印壁画　狮子冲　南京

中图分类号：K871.42　　**文献标识码**：A

2013年1—6月，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今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在市栖霞区新合村狮子冲北象山调查并发掘了两座南朝特大型砖室墓，编号为2013NQSM1、M2[1]。两墓位于北象山南麓，坐北朝南，东西并列（东：M1，西：M2），墓坑间相距仅10米（参见本期《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第34页图二：M1、M2平面图；简称参见第34页图二，下同），东南距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文帝永宁陵”神道石兽约400米。经调查和钻探可以确认，两墓与石兽、神道、陵垣等共同构成了一座完整的陵园[2]。两墓形制基本相同，均为平面呈“凸”字形的单室砖墓，甬道内设两重石门，墓室平面近椭圆形，墓室外壁四周与墓坑之间加砌放射状砖墙（参见第34页图二），墓室内均残存拼砌整齐的砖印壁画，墓室填土中发现了大量扰乱的模印画像砖，砖面铭刻内容丰富，砖侧纹饰多样。依据两墓的形制规模、甬道内设两重石门以及墓室内砌筑“羽人戏龙”、“羽人戏虎”[3]、“竹林七贤”砖印壁画等因素，结合以往的认识，基本可以断定这两座墓葬属南朝时期帝陵级别的大墓。尤其重要的是，两墓分别出土了一块纪年砖，为两墓的营建年代及墓主人身份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线索。本文拟在考古发掘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对这两座南朝大墓（以下简称两墓）的墓主身份展开探讨。

一　前人关于狮子冲陵墓石兽及墓主身份的研究

狮子冲保存至今的一对陵墓石兽，与周边萧梁王侯墓前以狮形为基本造型的辟邪不同，是以虎形为基本造型的麒麟。从南京、丹阳、句容三地现存的南朝帝王陵墓石刻来看，墓前安置麒麟的均属帝陵[4]。狮子冲的这对麒麟，历来有刘宋文帝长宁陵前石兽和陈文帝永宁陵前石兽两说。20世纪30年代，朱希祖先生（以下略去敬称）排除宋文帝长宁陵说，认定其为陈文帝永宁陵[5]。然而，宋文帝长宁陵之说根深蒂固，朱希祖之子朱偰在《六朝陵墓总说》及《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中即倾向于长宁陵说[6]。1957年，南京市江宁县麒麟门外灵山南麓新发现了石辟邪，朱偰在其所撰《修复南京六朝陵墓古迹中重要的发现》一文中，改变先前的观点，认为灵山发现石辟邪的附近才应该是宋文帝长宁陵，转而支持狮子冲石兽为陈文帝永宁陵说[7]。1973年，在灵山南麓附近发掘了一座南朝大墓，当时曾有意见认为灵山大墓才是陈文帝永宁陵。然而，公开发行的书籍与图录则大多沿袭1957年朱偰的观点，认为狮子冲风格华丽的石兽是南朝晚期的遗物，从而认为狮子冲是陈文帝永宁陵的所在[8]。1988年，这对石兽被

收稿日期　2015-07-04

作者简介　许志强（1982-），男，南京市考古研究所馆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博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汉唐考古与历史。

张学锋（1962-），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汉唐考古与历史。

基金项目　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10&ZD069）。

© Nanjing Museu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dnwh.njmuseum.com/

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即采用了朱希祖父子的观点，之后已然成为定说。

针对这一争论，罗宗真通过对宋文帝长宁陵和陈文帝永宁陵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尤其是通过对灵山大墓高达79厘米的青瓷莲花尊的考察，认为这类莲花尊在国内其他地区亦均见于南朝晚期和隋代墓葬中，因此认定灵山大墓就是陈文帝永宁陵；而狮子冲石兽与陈武帝万安陵石兽相去甚远，反而与萧齐帝陵前的麒麟酷似，因此认为狮子冲石兽更具有南朝早期石兽的特征，并推测是宋文帝长宁陵石兽被迁走后，齐梁时期的工匠仿齐武帝景安陵前麒麟重新刻制树立的，由此确认狮子冲是宋文帝长宁陵所在地[9]。

日本学者町田章的观点与之相近，其在《南齐帝陵考》一文中认为，宋孝武帝从襄阳得来形势甚巧的麒麟放置在狮子冲宋文帝长宁陵前，为以后的南朝诸陵树立了麒麟的模范，现存萧齐诸陵麒麟有可能都是仿此而刻，尤其是齐武帝景安陵前的麒麟仿得更为相似[10]。

日本学者曾布川宽是较早运用美术史样式学的理论方法对南朝陵墓石刻展开研究的学者，其在《南朝帝陵的石兽与砖画》一文中认为[11]，狮子冲石兽整体呈狮形，是所谓的麒麟，采用了梁代内侧前肢前伸的形式[12]，与丹阳三城巷(4)梁简文帝庄陵石兽非常相似：兽头很大，顶角粗大，表面有凹凸不平的鳞纹，四肢粗短，爪子朝上；而且比庄陵的石兽更加夸张：项脖几乎消失，头显得过大，胸部像球一样滚圆，四肢也过于粗壮，眼睛和眉毛更加突出，口部周围的肌肉更加发达，双翼前部上卷的羽毛和腰部的羽毛完全演变成纹样化了的云气纹，不再刻出羽根，更加脱离写实性；比在陵口、三城巷(1)[13]所看到的、从头后部贯通背部一直到腰尾部的连珠纹带更加发达，而且尾部的连珠纹两侧还附有涡纹，图案化的倾向越发明显。基于这些认识，曾布川宽认为狮子冲石兽在继承梁末陵口石兽和梁简文帝庄陵石兽的基础上又显示出陈代的新风。曾布川宽的结论虽然依然倾向于陈文帝永宁陵，但非常明显，他看出了狮子冲石兽与梁末石兽之间的关系。

关于狮子冲石兽墓主人的推测还有其他一些观点[14]，但主要围绕宋文帝长宁陵说和陈文帝初宁陵说展开争论。从前人的研究成果中不难看出，早期关于狮子冲石兽墓主身份的判断，由于缺乏相应的考古资料和理论方法，只能停留在传统史学研究的范畴内，通过梳理文献记载来加以探讨，甚至很少涉及到石兽这个“物”本身；而地志中所谓“某陵在某方向某里”、“某陵在某方向某里某乡”等叙述，往往具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墓主身份的问题[15]。曾布川宽首先运用美术史学中常用的样式学理论，直接将石兽这个“物”作为考察对象，对现存南朝帝陵石兽的墓主认定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就狮子冲石兽而言，他虽然叙述上倾向于陈文帝永宁陵，但却非常敏锐地看出了它们与梁代末期石兽的密切关系，为进一步的考察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2006年，王志高发表了《梁昭明太子陵墓考》，通过对文献所载昭明太子墓所在方位道里的梳理，比照萧梁晚期帝陵神道石兽的形制特征，推测狮子冲石兽或为梁昭明太子安陵之物，且推测其生母丁贵嫔宁陵亦当在狮子冲附近[16]。

王志高的这一观点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不过，狮子冲石兽的墓主是否是昭明太子，文中所言旧地图上的“东林”、“西林”是否就是“东陵”、“西陵”的音讹，“西陵”是否就是昭明太子安陵，“东陵”是否就是丁贵嫔宁陵，即昭明太子安陵与丁贵嫔宁陵的位置关系如何，等等，都还需要通过考古发掘资料来加以验证。因此，此次狮子冲两墓的发掘，为考证上述神道石兽的归属及相关问题提供了直接且有力的证据。近日，王志高依据所获部分资料又撰文《再论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陵墓石兽的墓主人身份及相关问题》，再次确认狮子冲陵墓石兽主人为昭明太子和丁贵嫔的观点，并对南朝陵墓制度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17]。

本文的结论与王志高的观点一致，认为狮子冲两墓的墓主人分别是萧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其生母丁贵嫔。不过，本文依然想利用此次发掘所获资料，通过以下论述来展示我们在田野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中关于墓主身份的思辨和论证过程，以期给读者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结论。

关于狮子冲两墓的时代和墓主身份，我们想通过墓葬的形制特征、墓室内的壁画装饰、神道石兽的样式、埋葬形式、出土的纪年砖以及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等几个方面来展开考察。

二　基于墓葬形制、规模的考察

(一)形制

狮子冲两墓均为单室墓，墓室后壁外弧明显，两侧壁略弧，墓室前端左右呈弧角与甬道相连。这种墓葬平面形制与南京栖霞区的甘家巷6号墓(梁安成王萧秀墓)[18]、老米荡梁墓(推定为

© Nanjing Museu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njmuseum.com

梁南平王萧伟墓)[19]、白龙山南朝墓(梁临川王萧宏墓)[20]、甘家巷北梁桂阳王萧象墓[21]、灵山萧子恪墓[22],丹阳的胡桥仙塘湾南朝墓(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23]、建山金家村南朝墓(推测为齐明帝萧鸾兴安陵)[24]、胡桥吴家村南朝墓(推定为齐和帝萧宝融恭安陵)[25]以及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大墓(推断为陈宣帝陈顼显宁陵)[26]等帝王陵墓的平面形制基本相同[27],具有典型的南朝中晚期大型墓葬的形制特征。

(二)砖墙

两墓墓坑与砖室之间加砌数十道放射状的砖墙,其名称与功能目前尚无定论。从工程力学来说,对坑壁几近垂直、单室面积有五六十平方米之大的砖室墓而言,来自墓顶及填土、封土的压力是巨大的,砖室与墓坑间的数十道砖墙和砖墙之间夯实的填土,从外侧给予砖室四壁以推力,增加墓室四壁的受力度,防止墓室坍塌,这一点应该是无疑的。墓室面积越大,这类功能性的砖墙就越有必要,因此,砖室与墓坑间砖墙的有无又与墓葬的等级规模有关。迄今所见六朝高等级墓葬中,能够确认墓坑与砖室之间加筑数十道放射状砖墙的有胡桥齐景帝修安陵、建山齐明帝兴安陵、胡桥吴家村南朝墓三座帝陵,而南京周边发掘的多座萧梁王侯墓葬,单从公布的发掘资料看,除梁安成王萧秀墓的前半部加筑了六道砖墙外,其他均未见到。此外,被推定为陈宣帝显宁陵的西善桥油坊村大墓,也未加砌放射状的砖墙,不过发掘剖面图显示,显宁陵墓坑的坑壁不同于齐梁帝陵的垂直形状,而是采用了口大底小的倒梯形,而且在墓坑的东西两壁加砌了护墙[28]。倾斜的护墙减轻了来自填土、封土的压力,呈现出有别于齐梁帝陵的特色。因此,现有资料表明,在墓坑和砖室间加筑砖墙是齐梁帝陵特有的形制特征。由此可见,狮子冲两墓具有齐梁帝陵的基本特征。

(三)石墓门

两墓的甬道内设置两重石门(参见第40页图十五、第45页图二十五)。在目前所掌握的东晋南朝大型砖室墓中,除甬道口设置封门墙外,甬道内是否设置墓门、设置几道墓门,是判断墓葬等级的一个基本要素。甬道内设置两道墓门,东晋时期应已成为帝陵的规制。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29]、南京北郊东晋墓(汽轮电机厂大墓)[30]、南京富贵山东晋墓[31]甬道内均设置两道墓门,其中北园东晋墓被推定为东晋成帝兴平陵[32],汽轮电机厂大墓被推定为东晋穆帝永平陵,而富贵山东晋墓则被推测为东晋安帝休平陵或恭帝冲平陵。东晋帝陵甬道中的两道墓门,发掘时均已不存,只剩下门槛痕迹,推测当时使用的是木门。进入南朝以后,帝陵的这一规制并没有发生改变,只是甬道内的木门变成了石门。上文再三提及的胡桥仙塘湾齐景帝修安陵、建山金家村齐明帝兴安陵、胡桥吴家村齐和帝恭安陵和南京西善桥陈宣帝显宁陵四座帝陵,甬道内均设置了两道石质墓门,而上文所及南京郊区众多的萧梁王侯墓,甬道内无一例外地均设置一道石墓门。因此,甬道内设置两道石墓门的狮子冲两墓,具备了南朝帝陵的规制。

(四)墓室规模

M1墓室长8.4、宽5.0米,M2墓室长8.32、宽4.88米,与胡桥仙塘湾大墓(长9.4、宽4.9米)、建山金家村大墓(长8.4、宽5.2米)、胡桥吴家村大墓(长8.2、宽5.2米)和南京西善桥大墓(长10、宽6.7米)非常接近,达到了目前所知南朝齐、梁、陈帝陵的规模。

因此,从墓葬的形制特征判断,狮子冲两墓应该是齐梁帝陵级的墓葬。

三 基于墓室壁画与神道石兽的考察

(一)砖印壁画

狮子冲两墓的墓壁原本均装饰有各种题材的壁画。由于南方地下水位较高,因此,六朝墓葬的室内装饰与中原地区的彩绘壁画不同,更多采用模印各种图案及其他内容的墓砖砌筑而成,最常见的有各种莲花纹、草叶纹、钱纹、龙虎纹、侍者、力士、神怪等,这类装饰既见于高等级墓葬,也见于一般等级的砖室墓。然而在高等级墓葬中,可见一种用数量较多的模印纹饰砖按一定顺序拼接的壁画场面,这类拼接整齐的壁画,学界有"画像砖"、"砖刻壁画"、"砖拼壁画"、"拼镶砖画"、"拼嵌壁画"等多种不同称呼。林树中认为,这种壁画是用粘土在木模上印成砖坯,然后烧造,其全称应该是"木刻砖印壁画"或"木模印砖壁画",可简称"砖印壁画"[33]。本文采用这一命名。

迄今发现带有拼接完整的大型砖印壁画的墓葬为数并不多,计有胡桥仙塘湾大墓、胡桥吴家村大墓、建山金家村大墓、西善桥油坊村大墓及西善桥宫山大墓等五座,墓室内砖印壁画的主要内容和出土状况简介如下(括号中的"毁"表示破损十分严重):

© 南京博物院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njmuseum.com/.

1、胡桥仙塘湾大墓：羽人戏虎图（毁）、竹林七贤图（左壁毁）、骑马武士（右壁）、持戟侍卫（右壁）、持伞盖侍从（右壁）、骑马乐队（左壁）；

2、建山金家村大墓：日月图、狮子图（左右壁）、门卫武士图（左右壁）、羽人戏龙图（毁）、羽人戏虎图（左壁）、竹林七贤图（左壁。右壁半幅毁）、骑马武士、持戟侍卫、持伞盖侍从、骑马乐队（以上四项均为右壁）；

3、胡桥吴家村大墓：羽人戏龙图、羽人戏虎图（毁）、竹林七贤图（左壁，右壁毁）；

4、西善桥油坊村大墓：狮子图（左壁，右壁毁）；

5、西善桥宫山大墓：竹林七贤图（左、右壁）。

前四座大墓的墓主人虽然还存在一些争论，但作为帝陵是没有异议的；宫山大墓因出土了最完整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而闻名，但墓葬的时代和墓主人自发现以来就有各种意见。1960年发掘时，由于可资比较的六朝大墓资料相对贫乏，发掘简报非常谨慎地推测为东晋至刘宋时期的墓葬[34]；也有将其明确断为刘宋帝陵的[35]。然而，从宫山大墓的平面形制、甬道设置一道石门、墓室内铺石棺床、墓壁设桃形灯龛以及墓室内出土的各类纹饰砖和砖印壁画、青瓷器及陶俑的型、式等特征来看，时代应属于南朝中晚期，很有可能是陈废帝陈伯宗的墓所[36]。宫山大墓甬道中只设一道石门，可见是按王侯之礼营建的，但陈伯宗又是曾经的皇帝，因此使用了“竹林七贤”壁画，这些似乎都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从西善桥油坊村大墓墓室中仅见模印壁画的狮子，不见“羽人戏龙”、“羽人戏虎”、“竹林七贤”等大型壁画场面来看，墓室中装饰组合完整的模印壁画这一制度，到陈朝时似乎已不很严格。反过来说，帝陵中装饰完整的模印壁画可能是齐梁萧氏王朝的制度。

2011年，浙江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地的部分南朝墓中也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砖印壁画，其中最多的是模印在单砖正面的“千秋万岁”、“狮子”、“仙人骑龙”、“仙人骑虎”、“朱鸟”以及莲花等各式图案，也有较多是由模印砖拼砌而成的壁画，如墓室南壁甬道两侧的“将军”，墓室东西两壁上的“吹笙”、“吹箫”伎乐飞仙。值得注意的是，盗毁严重的M1的东西两壁上残留了部分大型砖印壁画，有飞行的羽人和体形修长呈游走状的龙、虎的躯干及爪、足，画面残长1.5米以上，可以判断，M1东西两壁原来装饰有完整的“羽人戏龙”和“羽人戏虎”砖印壁画，且用于拼砌的模印画像砖的铭文格式、拼接方法与南朝齐梁帝陵如出一辙[37]。规模如此巨大的小横山东晋南朝墓地没有发现一块墓志，墓主信息不甚明了，有学者推测是当地土著豪族[38]。M1通长6.65米，虽然属于六朝较大型的砖室墓，但与南朝帝王陵墓相距甚远，墓葬中为何使用“羽人戏龙”、“羽人戏虎”砖印壁画，目前尚无合理的解释。

此外，2010年南京市博物馆在南京南郊石子岗发掘了一座南朝墓葬[39]，墓室大量使用制作精美的模印画像砖，但却完全没有按壁画的场景拼接，且有些模印砖内容相同，如出土了数块书有“刘灵”的题榜砖，显然该墓使用了大量的“竹林七贤”模印砖，而且还有可能与宫山大墓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为同范砖。2012年，南京雨花台区小村发掘的南朝砖室墓（M1）中也出土了数块与“竹林七贤”、龙、虎等题材相关的模印画像砖，砖侧的图案、砖面的铭刻格式与已发现的南朝帝陵中的模印画像砖如出一辙[40]。遗憾的是，上述现象目前依然难有合理的解释。

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作为南朝齐梁帝陵级别的墓葬，室内所饰砖印壁画的规制是相当严格的，除常见的莲花及各种植物、云气、散花等装饰图案外，还必须具备以下内容：（1）甬道两侧的狮子图及守门武士图；（2）由骑马武士、持戟侍卫、持伞盖侍从和骑马乐队共同构成的出行图；（3）羽人戏龙、羽人戏虎图；（4）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5）朱雀、玄武、日月图。只有具备了以上内容组合，才能视为齐、梁两代萧氏帝陵。对照上述规制，狮子冲两墓虽然没有发掘到底，但目前发现的砖印壁画以及散乱在填土中的模印砖铭刻，已经显示了上述五项内容。

1、M1、M2均出土带“师子”、“直（值）阁”铭刻的画像砖，显示原本装饰有狮子图及守门武士（直阁或值阁将军）图[41]（参见第36页图五：6、7）。

2、M1东壁在发掘停止面露出了部分戟、车盖等图像的顶部，显示存在出行图。两墓均出土带“具张”、“笠戟”、“迅繖”（“繖”同“伞”）、“家脩”等表示持兵持物的自铭画像砖（参见第36页图五：10、11、14、8）。“具张”对应的是骑马武士，“笠戟”对应的是持戟武士，“迅繖”对应的是执扇盖侍从，“家脩”对应的是骑马乐队，这些画像砖拼砌成了完整的出行图。

3、M1西壁残存“羽人戏虎”图；东壁盗毁严重，原本应有对称的“羽人戏龙”图，发掘停止面以下或有部分残留。M2发掘停止时，东西两壁南

© 南京博物院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jnmuseum.com/

端均露出了部分须、角、尾等图像，可断定在停止面以下存在东西对称的“羽人戏龙”、“羽人戏虎”图。两墓填土中均出土带“天人”铭刻的画像砖，“天人”即“羽人”。

4、M1西壁保留完好的“竹林七贤”图（参见第39页图十二）；东壁盗毁严重，原本应有对称的半幅“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M2至发掘停止面时尚未发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但从墓室的扰乱土中检出了“王戎”、“嵇康”、“阮咸”、“山涛”四块铭文砖，可知M2无疑装饰有“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

5、M1、M2填土中均出土了带“朱鸟”、“玄武”、“大月”铭刻的画像砖，M2还出土了带“大日”、“小日”铭刻的画像砖（参见第36页图五：3、4、12；第43页图十九：5、8）。M1发现的部分“朱鸟”铭文砖为楔形砖，推测朱雀图案应在墓室或甬道的券顶部位。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对狮子冲两墓砖印壁画的内容及基本布局有了一个初步认识。目前，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对两墓出土的自铭画像砖正在进行整理，待资料正式面世后，我们将对两墓的砖印壁画再作深入探讨。

（二）神道石兽

该问题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有探讨，从前人研究的发展脉络来看，对狮子冲石兽年代的判断，越往后越趋向于梁代末期。曾布川宽、王志高等人的论述已比较清晰，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通过对狮子冲两墓砖印壁画内容的考察，狮子冲两墓符合齐梁帝陵的规制；参考神道石兽的样式特征，其时代范围又可以限定到萧梁中晚期。

四　基于出土纪年砖的考察

狮子冲两墓的墓室堆积中分别出土了一块纪年砖：M1出土纪年砖（M1：1）铭自左往右为“师李/中大通弍年五月/廿七日於俊趺作此/砖大好可用”，M2出土纪年砖（M2：1）铭自左往右为“师张正員/普通七年”，两砖显示的均为梁武帝在位时的年号（参见第40页图十四、第45页图二十四）。

（一）M1纪年砖

首行的“师李”，显示制作这批墓砖的工匠团队中有个姓李的技术工头；第二行中的“中大通弍年”为公元530年，工匠起初误写作“元年”，后来加了一笔，成为“弍年”；第三行中的“於俊趺”三字系笔者据砖铭隶定，意义不很明确，可能是制砖匠人的姓名；最后的“作此/砖大好可用”，常见于工匠对产品的自夸。

（二）M2纪年砖

“普通七年”为公元526年；下端稍有残破，以下的“师张正員”，是墓砖工匠中姓张名正員（员）的技术工头。

据现场发掘资料，M1的封土叠压于M2封土之上，说明M1的建造时代晚于M2。M2建于山体的原始缓坡上，而M1所处位置本为坳地，填平后再凿穴营墓。按一般习惯，先葬者会优先选择佳地，后葬者为使墓穴紧挨先葬者，只能先填平低洼，再开挖建墓，这间接说明了M1的时代晚于M2。M1纪年砖显示的是公元530年，M2纪年砖显示的是公元526年，这与上述考古迹象所揭示的事实完全一致，排除了两块纪年砖在陵墓遭盗毁时相互扰乱的可能。

关于“张正員”的解释，王志高在《再论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陵墓石兽的墓主身份及相关问题》中称：“M2出土的纪年铭文砖上的‘张正员’，一种可能是姓名，但笔者更相信其中的‘正员’系指职官，《隋书·百官志上》即云梁代太子属官左、右卫率下有正员司马督四人，简称正员司马，正员司马督或掌土木之工。若此分析不误，则铭文砖上的‘张正员’当即张姓正员司马督之省，他曾经负责丁贵嫔陵地砖瓦的烧制。显然，这块与太子属官相关的铭文砖的发现，亦可作为M2墓主就是丁贵嫔的佐证之一。”[42]笔者认为，这一推测存在着相当大的误解。

“正员”一词并非职官名称，而是相对于“员外”而言的。如《隋书·百官志上》载天监六年（507年）诏曰：“通直常侍，本为显爵，员外之选，宜参旧准人数，依正员格。”就王志高作为论据的《隋书·百官志上》所载太子左、右卫率而言，完整的文章应为“二率各置殿中将军十人，员外将军十人，正员司马四人，又有员外司马督官”[43]。可见，“正员”不是职官名称，只是表示正式岗位和非正式岗位的区别。担任“正员司马”的张姓人绝无可能将姓名、官职略称为“张正员”。况且，烧造皇室或官府用砖的官署是将作监甄官署，太子府属官通常不会参与砖瓦的烧造。

其实，将“师张正员”误解成“张姓正员司马督之省”，源自对这一类砖铭性质的误解。六朝墓砖文字基本分成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模印在砖侧的文字，有烧造年月、工匠姓名、墓主姓氏职官、砌筑部位等内容。利用模印方式，说明这类砖需求量大；第二类是用竹刀等工具在砖坯未干时刻

©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写在砖面的文字，如用于砌筑砖印壁画的模印砖正面的“左将军下中第一”、“龙下三第六”等，这些文字砖的侧面都有模印的纹样，刻写的文字是给营墓匠砌墓时的指示性文字。这些文字具有唯一性，且墓砌成后不露出墓室壁面。第三类同样是用竹刀等工具在砖坯未干时刻写在砖面上的文字，但它们往往是工匠在生产过程中偶然刻写，随机性非常强。内容以当时的年月日、工匠集团的主管人或周边同伴的姓名、几无意义的刻划等为主，偶见人头像或动物形象，近似“涂鸦”，几无规律所循。狮子冲两墓的两块纪年砖就属于这一类“涂鸦”砖，但其保留的纪年信息却成了我们今天解决墓主身份问题的重要线索。

“普通七年”和“中大通二年”纪年砖的发现，明证了两墓的营建时间均在萧梁时期。检索文献可以发现，普通七年是梁武帝之子昭明太子生母丁贵嫔的卒年，中大通二年是昭明太子卒前一年。这两块纪年砖的出土，让狮子冲两墓与因编集《文选》而著名的昭明太子萧统及其生母丁贵嫔之间产生了联系。

五　基于历史文献的考察

南京市东北郊栖霞区甘家巷一带为萧梁陵墓区，就目前的发掘资料而言，自西北往东南分布着萧伟、萧景、萧憺、萧恢、萧秀、萧融、萧象、萧宏等王侯及其家族墓葬；从地望看，狮子冲两墓无疑位于萧梁陵墓区范围内，应属萧梁皇室成员墓葬，先前的宋文帝长宁陵说和陈文帝初宁陵说均与此相悖。

六朝时期流行夫妇同穴合葬，帝后也不例外。经调查和发掘，狮子冲两墓位于同一陵园内，但又独立成坟，因此，可以排除两墓是某位皇帝与皇后的合葬墓。那么，据出土纪年砖提供的时间信息，狮子冲两墓有无可能是昭明太子及其生母丁贵嫔的陵墓呢？

母子同处一个陵区的事例在南朝并不鲜见。据文献所载，在刘宋诸帝中，孝武帝景宁陵及其生母路太后修宁陵，位于今南京南郊岩山陵区[44]；明帝高宁陵及其生母沈太后崇宁陵，位于今南京北郊幕府山陵区[45]。这两组陵座虽然葬在同一陵区，但两墓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少，是否如狮子冲两墓这样墓坑之间仅有10米？目前仅据上述史料还无法得知。《宋书》卷七十九《武昌王浑传》载，宋文帝第十子武昌王刘浑孝建年间（454—456年）被逼令自杀，先葬襄阳，后于大明四年（460年）准许“还葬其母江太妃墓次”[46]。“墓次”就是墓侧、墓旁，因此母子二人的墓穴存在着并列的可能性。

有迹象表明，昭明太子曾在其母丁贵嫔的墓侧为自己选择了墓地。梁武帝郗皇后薨逝较早，武帝此后一直没有册立皇后，丁贵嫔因受武帝宠爱，又生育了昭明太子及后来的简文帝，母以子贵，“位在三夫人之上，……典章礼数，同于太子，言则称令”[47]。普通七年十一月庚辰，丁贵嫔薨，“诏吏部郎张缵为哀册文，有司奏谥曰穆，葬宁陵，祔于小庙。简文即位，追崇曰太后”[48]。丁贵嫔宁陵的所在，相关记载并未言及，地点不明。萧梁帝后薨亡后通常归葬故里兰陵县东城里山（今丹阳市东北郊三城巷迤北），但王侯及其家族死后均葬在都城建康（今南京市）附近。兰陵东城里山陵区为梁武帝营建的修陵，已经葬入了郗皇后，加上丁贵嫔没有皇后的身份，因此死后自然不能归葬兰陵，应该就在建康附近觅地埋葬。从给予丁贵嫔陵号的做法以及下文所引为丁贵嫔市买墓地的记载来看，也应该是在建康附近为丁贵嫔单独建立了陵园。

关于丁贵嫔墓地的选择，《南史》卷五十三《梁武帝诸子传》记载：

> 初，丁贵嫔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阉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万，许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49]

文中所见“墓侧长子位”并非指丁贵嫔墓侧的位置是专为昭明太子下葬时预备的，而是当时丧葬制度中的一种观念。昭明太子如果登基为帝，薨亡后一定会归葬兰陵东城里山陵区。然而，中大通三年（531年）四月，昭明太子因病而薨，未能继位，这时，观念中的“长子位”就有了现实意义。昭明太子对生母感情很深，《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载：

> （普通）七年十一月，贵嫔有疾，太子还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带。及薨，步从丧还宫，至殡，水浆不入口，每哭辄恸绝。高祖遣中书舍人顾协宣旨曰：“毁不灭性，圣人之制。《礼》，不胜丧比于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毁如此！可即强进饮食。”太子奉敕，乃进数合。自是至葬，日进麦粥一升。高祖又敕曰：“闻汝所进过少，转就羸瘠。我比更无余病，

© Nanjing Museu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jnmuseum.com

> 正为汝如此，胸中亦圮塞成疾。故应强加饘粥，不使我恒尔悬心。”虽屡奉敕劝逼，日止一溢，不尝菜果之味。体素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每入朝，士庶见者莫不下泣。[50]

按照刘宋以来母子可以同处一个陵区的惯例，启用“墓侧长子位”为孝道过人的昭明太子营建墓地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从上引昭明太子为丁贵嫔选择墓地可以看出，昭明太子对葬地的选择颇为重视，但在宦官俞三副的干涉下，梁武帝没有采用太子所选的墓地。经发掘可知，狮子冲M2的墓穴开凿在山坡的高昂之处，其东侧是一处低洼的山坳，很明显这里原本就是为了营建M2选择的，并没有意识到今后还会在这里营建M1。但后来道士相墓时发现这处墓地“不利长子”，于是采用在墓侧的“长子位”埋入“蜡鹅及诸物”来加以补救。昭明太子死后启用生母丁贵嫔墓侧虚设的“长子位”时，不得不通过人工填埋的方式抬高地表高度，在人工堆筑的山体上凿穴建墓。考古发掘中的这一现象，同样也揭示了位于同一陵园内、东西并列、墓坑紧邻、封土相接、墓前对应一对石兽的狮子冲大墓为丁贵嫔与昭明太子母子墓的可能性。

丁贵嫔宁陵的具体方位目前在史籍中找不到任何线索，而昭明太子陵的方位道里却在唐宋文献中留下了部分记载。据《梁书》本传，昭明太子薨亡后，“五月庚寅，葬安宁陵”[51]。《建康实录》卷十八载，昭明太子中大通二年“四月辛巳薨，……五月庚辰，葬安宁陵。案，……陵在建康县北三十五里”[52]。《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一》载：“梁昭明太子安陵，在县东北五十四里查硎山。”[53]《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三《风土志二·古陵》载：“梁昭明陵，在城东北四十五里贾山前。”[54]上述四种文献中，昭明太子的陵号有“安宁陵”和“安陵”两说，关于这一点，前引王志高《梁昭明太子陵墓考》已经做出了辩证，按萧梁一代陵号的特征，昭明太子陵不可能使用双字命名，遵从《元和郡县图志》的说法应为“安陵”。本文采用这一观点。关于安陵的方位道里，《建康实录》、《元和郡县图志》、《景定建康志》三者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可能是因为参照坐标以及所经路途的不同、甚至是误抄而引起。总之，是在今南京市区东北四五十里处，与今狮子冲的方位道里基本相符，位于以甘家巷为中心的萧梁陵墓区范围内[55]。

按陵寝制度的规定，太子与皇后的墓葬可以号墓为陵。昭明太子安陵之所以在《梁书》、《南史》本传及《建康实录》中记为“安宁陵”，这正是昭明太子与其生母丁贵嫔葬在同一陵园内的反映。这处带有明显的陵垣、共用一个神道和一组石刻的陵园，因园内有昭明太子的安陵和丁贵嫔的宁陵而合称“安宁陵”，这应是情理之中的事。

丁贵嫔的陵号既有可能是初亡时梁武帝所赐，也有可能是其子简文帝萧纲继位后追崇其为穆太后时所加，笔者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萧纲继位后，追崇自己的母亲为皇太后，将同在一处的丁贵嫔墓和同母兄长昭明太子墓按帝后陵墓的规制大加修缮，这完全合乎情理。而这也正是狮子冲石兽的样式与萧梁末期的陵口石兽、简文帝庄陵石兽以及三城巷(1)石兽基本一致的原因。

六　结语

以上，我们在梳理前人关于狮子冲陵墓石兽及墓主身份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狮子冲两墓的考古发掘资料，从墓葬的形制规模、砖印壁画与神道石兽、纪年文字砖等几个方面，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推断其中的一座是梁昭明太子萧统的安陵(M1)，另一座是太子生母丁贵嫔的宁陵(M2)。

据文献记载，昭明太子墓在梁末的动乱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南史》卷六十四《杜崱传》载，太清三年(549年)杜崱、杜岸兄弟一起由岳阳王萧詧叛归湘东王萧绎，后在一次战斗中，杜崱的兄弟杜巘、杜岸及其母、妻、子女等被萧詧所获，皆斩于襄阳北门，并“尽诛诸杜宗族亲者，幼弱下蚕室，又发其坟墓，烧其骸骨，灰而扬之，并以为漆髑”，从此杜氏兄弟与萧詧结下深仇大恨。承圣元年(552年)，杜崱应萧绎之命随王僧辩东讨侯景，“及建邺平，崱兄弟发安宁陵焚之，以报漆髑之酷，元帝亦不责也”[56]。杜崱兄弟之所以要发安、宁二陵，是因为仇敌萧詧是昭明太子第三子。可以想象，这次毁陵必然对陵园门阙、地下玄宫等进行了彻底毁坏。发掘证明，狮子冲两墓的墓门、墓室损毁非常严重，决非普通的盗墓行为所致，而应该是杜崱兄弟毁陵报仇行为的结果[57]。这同样也佐证了狮子冲两墓的墓主分别为梁昭明太子萧统及其生母丁贵嫔。

---

[1]两墓的发掘情况详见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

[2]狮子冲陵园勘探、试掘的相关资料现存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待刊。

© 南京博物院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dfwh.njmuseum.com/

[3]因墓葬盗毁严重，未留下完整的“羽人戏龙”、“羽人戏虎”壁画，此处据墓葬填土中数量较多的“大虎”、“大龙”文字砖及砖侧的模印纹样推断。

[4]南朝帝王陵墓前所置石兽的名称多样。就南朝及唐初成书的文献而言，《南齐书·豫章文献王嶷传》将刘宋长宁陵石兽称为“骐驎”；《梁书·武帝纪》载建陵石兽震动事件时，也称其为“石骐驎”；《南史》卷七在叙述建陵石兽震动事件时却写成了“石辟邪”；《隋书·五行志》在叙述建陵石兽震动事件时，先称其为“石骐驎”，后又称其为“辟邪”。然而，《南齐书》作者萧子显是南朝齐梁时人，其说值得遵从。“骐驎（麒麟）”应是这类石兽在南朝时期的名称，“辟邪”则可能是出自功能方面的称呼。朱希祖在《天禄辟邪考》中认为帝陵前的独角石兽是天禄，双角石兽为辟邪，两者总称“桃拔”，王侯墓前的无角石兽叫“符拔”或“扶拔”，与“桃拔”为同类。但此仅为“正名”，其在《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中，也还是按照通俗叫法，将帝陵前的石兽统称为麒麟，将王侯墓前的石兽统称为辟邪。上引两文均见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出版发行，1935年；南京出版社2010年。本文遵从其说。又见〔日〕曾布川宽著、傅江译：《六朝帝陵》第五章，南京出版社2004年。

[5]同[4]，朱希祖：《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六朝陵墓调查报告》，第11–13页；南京出版社2010年，第122–125页。

[6]朱偰：《六朝陵墓总说》，《六朝陵墓调查报告》，第91页；《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中华书局2006年，第1、24页。

[7]朱偰：《修复南京六朝陵墓古迹中重要的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

[8]1973年发掘的灵山大墓，因出土形制巨大的青瓷莲花尊而著名，但完整的资料迄今未能公布，故无法详加探讨。参见罗宗真：《六朝考古》第四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1–72页。

[9]罗宗真：《六朝陵墓及其石刻》，《南京博物院集刊》第1辑，1979年；《六朝考古》第四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1–74页。

[10]〔日〕町田章：《南齐帝陵考》，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编《文化财论丛——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创立30周年纪念论文集》，同朋舍出版1983年，第1097–1098页；〔日〕町田章著、劳继译：《南齐帝陵考》，《东南文化》第2辑，1986年。

[11]〔日〕曾布川宽：《南朝帝陵の石獣と磚畫》，《东方学报》（京都）第六十三册，1991年3月。后由傅江译成中文，为与“六朝文化丛书”系列匹配，改名《六朝帝陵》，南京出版社2004年。

[12]曾布川宽运用美术样式学的分析，指出萧齐诸陵的石兽无一例外均是外侧前肢向前，梁代最早的陵墓梁文帝建陵，因是梁武帝即位后的追崇，因此建陵石兽继承了萧齐的形式，外侧前肢向前。外侧前肢前伸还是内侧前肢前伸，成为曾布川宽判断齐、梁石兽之别的重要依据。

[13]曾布川宽运用样式学的分析，认为丹阳陵口和三城巷（1）石兽是萧梁最晚期的作品，陵口石兽是梁代帝陵的总入口处，可能建于大宝三年（552年），而三城巷（1）则是逊位的梁敬帝萧方智的葬地，不是朱希祖父子认定的齐明帝萧鸾兴安陵。王志高认为，三城巷（1）石兽或为梁武帝萧衍祖父母萧道赐夫妇墓前之物，（王志高：《丹阳三城巷（1）南朝陵墓石兽墓主身份及相关问题考订》，《东南文化》2011年第6期）。对墓主的具体判断，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些差距，但在认为三城巷（1）作为梁代晚期石刻、而非齐明帝兴安陵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14]例如卢海鸣在其《六朝都城》第十一章中指出，将狮子冲石兽视为陈文帝初宁陵之说，无法解释狮子冲石兽更加接近梁代陵墓石刻的客观现象，认为狮子冲是陈文帝天嘉元年诏命梁元帝归葬“江宁旧垄”时为其营建的墓葬（卢海鸣：《六朝都城》第十一章，南京出版社2002年，第292–293页）。关于梁元帝萧绎归葬“江宁旧垄”的地点，王志高、周维林认为就是其生母阮太后所葬的“通望山”，在今南京市江宁区方旗庙（王志高、周维林：《南京方旗庙南朝石刻墓主为梁元帝萧绎》，《中国文物报》2005年4月1日第7版）。

[15]近年尚有学者撰文力主狮子冲陵墓石兽墓主为陈文帝，但切入点依然是地志所载方位道里及石兽的外在视觉，不得不说这样的视角已无法解决问题，如杨晓春：《略论南京上坊镇石马冲、栖霞山狮子冲两处南朝陵墓石兽遗存的墓主考订问题》，《南方文物》2013年第2期。

[16]王志高：《梁昭明太子陵墓考》，《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

[17][42]王志高：《再论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陵墓石兽的墓主身份及相关问题》，氏著《六朝建康城发掘与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85–295、292页。

[18]南京博物院等：《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群》，《考古》1976年第5期。

[19]南京博物院：《南京尧化门南朝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2期；南京市文物研究所、南京栖霞区文化局：《南京梁南平王萧伟墓阙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7期。最近王志高先生撰文，对老米荡梁墓的墓主认定提出质疑，认为墓主不是萧伟，而应该是梁末为吴平侯萧景新建的墓所（王志高：《南京尧化门外北家边南朝陵墓神道石刻墓主身份新证》，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等编《“六朝建康城　东方大都会”国际高层论坛论文集》，2015年5月）。本文暂从旧说。

[20]南京市博物馆等：《江苏南京市白龙山南朝墓》，《考

© Nanjing Museu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dnwh.njmuseum.com/

古》1998年第8期。
[21]南京博物院:《梁朝桂阳王萧象墓》,《文物》1990年第8期。
[22]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灵山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1期。
[23]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年第2期。
[24]南京博物院等:《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群》,《考古》1976年第5期。
[25]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第2期。
[26][28]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第6期。
[27]丹阳胡桥吴家村、建山金家村、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大墓墓主的推定有多说。吴家村、金家村大墓墓主的推定,本文采用曾布川宽的考订,见其著《六朝帝陵》相关章节;西善桥油坊村大墓墓主的推定,采用罗宗真的考订,见《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第6期,曾布川宽亦持同说。
[29]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年第4期。
[30]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4期。
[31]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第4期。
[32]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发掘当初就被推测为东晋前期元、明、成、哀四陵之一。又有元帝建平陵和成帝兴平陵两种不同意见,可参见蒋赞初:《南京东晋帝陵考》,《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合刊;罗宗真:《六朝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李蔚然:《论南京地区六朝墓的葬地选择和排葬方法》,《考古》1983年第4期》;王志高:《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的时代及墓主身份的讨论》,《东南文化》2003年第9期;吴桂兵:《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的形制、墓主及其他》,《东南文化》2003年第9期。笔者赞成晋成帝兴平陵说。
[33]林树中:《江苏丹阳南齐陵墓砖印壁画探讨》,《文物》1977年第1期。
[34]南京博物院:《南京西善桥及其砖刻壁画》,《文物》1960年第8、9期合刊。
[35]韦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第五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5–296页。
[36]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第三章,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77–79页。
[37]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博物馆《浙江余杭小横山南朝画像砖墓地M10、M12和M93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2年第5期;《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文物出版社2013年。
[38]张学锋:《读〈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札记》,《东南文化》2014年第3期。
[39]南京市博物馆:《南京雨花台石子岗南朝砖印壁画墓(M5)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5期。
[40]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小村南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年第2期。
[41]杭州余杭小横山M9、M100墓室南壁的甬道两侧均发现砖印武士图案,且自铭“将军”。或许受墓葬等级所限,小横山两墓的宿卫武士只能冠以“将军”,而南朝帝陵中位于甬道两壁的守门武士,应该就是铭刻中所称的“直阁将军”。见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博物馆编著:《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71–80、186–194页。
[43]《隋书》卷二十六《百官志上》,中华书局1973年,第723、727页。
[44]《宋书》卷六《孝武帝纪》、卷四十一《后妃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35、1288页。
[45]《宋书》卷八《明帝纪》、卷四十一《后妃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69、1294页。
[46]《宋书》卷七十九《武昌王浑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042页。
[47]《梁书》卷七《高祖丁贵嫔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60–161页。
[48]《南史》卷十二《后妃传下·武丁贵嫔》,中华书局1975年,第340页。
[49]《南史》卷五十三《梁武帝诸子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312–1313页。
[50][51]《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67、169页。
[52]唐·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卷十八,中华书局1986年,第722页。
[53]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83年,第598页。本卷贺次君校勘记[二七]称:“宜作‘安宁陵’,见本传,此脱。”按萧梁陵号制度,无需校改。
[54]宋·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二《风土志二·古陵》,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044页。
[55]《元和郡县图志》、《景定建康志》所载昭明太子安陵所在的查硎山和贾山,其具体位置目前尚难厘清,因对本文的论证过程并无实质性的影响,故略去不谈。
[56]《南史》卷六十四《杜崱传附兄岸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558页。
[57]类似的毁墓报仇行为在当时屡见不鲜。如《北史》卷八十四《王颁传》载,王颁是王僧辩之子,江陵陷落后入关中归附西魏,听闻父亲为陈霸先所杀,悲愤欲绝。隋平陈后,遂召集僧辩生前士卒一同掘墓复仇,挖出陈霸先遗骨焚烧,又取骨灰加水饮之。这种以报家仇为目的的有意识的毁墓,对陵墓的破坏程度可想而知。

© Nanjing Museu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dnwh.njmuseum.com

(责任编辑、校对:毛 颖)

A Discussion on the Identities of the Owner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ombs at Shizichong, Nanjing

XU Zhi-qiang ZHANG Xue-feng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Abstract: In January – June 2013, Nanjing Municipal Museum conducted an investigation and excavation on the two large brick chambered tombs dating to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t Shizichong, Xinhe Village, Qixia, Nanjing. The excavation was terminated before completion for a certain reason, it is believed, however, that the two tombs belonged to Xiao Tong, Prince Zhaoming of the Liang, and his biological mother Concubine Ding with evidence from the tomb scale, chamber structure, the survived pictorial bricks, the stone carved animals in front of the tomb, the inscription on the chronological bricks, the damages as well as the related historical literatures.

Key words: Southern Dynasties tombs; Prince Zhaoming; Xiaotong; Concubine Ding; stone caved animals; pictorial bricks; Shizichong; Nanjing

《东南文化》征稿启事

《东南文化》杂志是由南京博物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1985年创刊，目前被录入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HSSCD）、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全文期刊……

《东南文化》于2009年改版后，定位于中国大陆东南及港、澳、台地区乃至日、韩等东亚诸国文化遗产的探索、研究、保护、展示与利用等，加强了对文化遗产从保护、研究、管理到继承、欣赏、展示诸领域的理论创新与成功实践的关注，以适应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新内容、新趋势和新要求，凸现文化遗产地位，彰显东南地域特色，并努力打造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从而推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事业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主要栏目有：东南论坛、遗产保护理论、考古探索、地域文明、博物馆新论、专题研究、域外广角等。

《东南文化》真诚欢迎专家学者投稿，尤其欢迎有关遗产保护和相关学科探索的理论文章。现将稿件格式启事如下：

一、敬请作者提供文稿的同时尽量提供电子文本。文章的题目、100~300字的内容提要、关键词、作者单位需提供中英文各一份，并附作者简介（出生年月、工作单位、职称、主要研究方向、邮政编码）。

二、来稿以1万字内为宜，并要求文字精炼、标题准确、层次清晰、资料新颖、观点鲜明、图文并茂；引文核对准确，注释一律置于文末并注明详细出处；线图、拓片及照片质量精美，凡线图、拓片及照片为复印件的来稿，一概不用。

三、自收稿之日起，编辑部将在6个月内答复处理意见。如在此期限内未收到录用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稿件并告知我刊。稿件一概不退，敬祈自存底稿。

四、本刊将已刊内容提供网站传播，为维护作者权益，免生著作权纠纷，凡不愿网络传播的作者，请在投稿时予以声明。

五、稿件请寄编辑部，勿寄个人，以免延误登记或遗失。

更为详尽的征稿启事请登陆《东南文化》网站（http://dnwh.njmuseum.com）查询。

通信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321号
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编辑部
邮政编码：210016
电　　话：(025)84841253
电子邮箱：dnwh@chinajournal.net.cn

(C)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